

1—11—1001

AGE OF EXTREMES

极 端  
的  
年 代

(上)

[英] 霍布斯鲍姆 著  
郑明萱 译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## 出版说明

常言道：历史犹如一面镜子，可以帮助人们知兴衰，明更替，了解世界大势之所趋，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，走好自己该走的路子。

当前，正值世纪之交，20世纪就要过去，21世纪即将来临。这时，如果能有一本史书，帮助我们回顾一下就要过去的“过去”，展望一下未卜的“将来”，那将是极为有益的。

幸运的是，在我们面前已经有了一本“当代人”写的当代史书——《极端的年代—1914—1991》。正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言，“这是一部由20世纪的当代作者，写给20世纪后期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”。它将为我们述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局部热战给人类带来的苦难，

40年“冷战”造成的不安，科技进步的利和弊，社会、教育、文化变革的长和短，资本主义发展的荣与衰，社会主义进程的得和失，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起和伏……以及即将跨入的21世纪前景的明和黯。还有，对整个20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意义作出应有的评估。书中，作者还夹叙夹议地、严谨坦率地讲说了自己的独到看法。相信读者读后将会有所得益。

当然，出版这么一本书，绝不意味着我们与作者持有完全同样的立场、观点，其目的不过是想为读者提供一种不落俗套的说法，一种有价值的参照，以助大家思考问题。至于书中所言，究竟哪些是对，哪些有错，相信亲爱的读者们自有明鉴。

## 作者简介

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（Eric Hobsbawm）

享誉国际，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。

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。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，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。1919年举家迁住维也纳，1931年徙居柏林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。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，完成中学教育，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。1947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，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，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。

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，自

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,迄今未曾脱离。就读剑桥大学期间,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,与威廉士、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;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,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《过去与现在》。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难,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的研究机会,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。

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,并延伸及17、18和20世纪;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、欧洲,广至拉丁美洲。除专业领域外,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、社会评论、历史学、社会学理论,以及艺术、文化批评等。他在劳工运动、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,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,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;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,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。如《新左评论》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: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。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,提倡实力政治;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、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。

霍氏著作甚丰,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,包括:《革命的年代》、《资本的年代》、《帝国的年代》、《盗匪》、《民族与民族主义》、《原始的叛乱》、《爵士风情》等书。霍氏现居伦敦。

## 前言与谢语

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

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 20 世纪历史，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。不为别的，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，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，可以（而且必须）由外向内观察，经由该时期的二手（甚至三手）资料，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。作为本书作者，本人一生的经历，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。其中多数时候，从青少年岁月开始，一直迄今，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分，而非以学者角色，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偏见。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，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之中，多数时间，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 1914 年以来的时代当作研

究题目。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，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。“本人的研究专期”——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——乃是 19 世纪。但在此刻，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，对 1914 年以来到苏维埃年代结束之间的“短促二十世纪”(Short Twentieth Century)，进行一番观察。有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，历来已经在人数同样盛大的本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。但是作者对这个时期的认识，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，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。

关于目前这个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，绝非任何一己之力所可窥其全貌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。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，绝对不可能如同——比方说——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(Byzantine Empire)的史学家们，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，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。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，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，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，也实在有失零星片断。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，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、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——比方冷战史实或 30 年代历史——以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；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，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。当然，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。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，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，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。

因此，本书的立足基点，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。它的资料来源，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，并有本人在“社会研究新学院”(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)执教时，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 20 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。除此，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“短促二十世纪”者的身份，累积了

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、回忆及意见，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“参与性观察者”的角色，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、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，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“好管闲事之人”吧。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，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、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；也不在于我知晓、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。事实上，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（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）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的经验发现，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，往往无甚收获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人物多是为公开记录发言。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，是那些可以、或愿意自在谈话，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。不过，能够亲自认识人、地、物，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。也许单单是 30 年的光阴过去，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—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(Valencia)或西西里的巴勒莫(Palermo)——就足以使人惊觉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中，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。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却深藏在记忆之中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所用。如果作为一名史家，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，多半归因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。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，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。

本书写作的来源，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、学生，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，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。在某些方面，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。有关科学的篇章，承蒙我的朋友艾伦·梦凯(Alan Mackay FRS)及约翰·梦达克斯(John Maddox)的校正，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，而且更如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记。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，有我在“新学

院”的同仁,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·泰勒(Lance Taylor)亲自校读。更多的地方,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、聆听讨论,并在“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”(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, UNU/WIDER)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,仔细竖耳倾听获得的心得。这个位于赫尔辛基(Helsinki)的研究机构,在贾亚瓦德纳博士(Dr. Laljayawardena)的领导之下,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研讨重地。整体而言,本人以麦克唐纳·道格拉斯(McDonell Douglas)访问学者的身份,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,所获裨益实在匪浅。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,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,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。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,虽然在此并未一一采纳;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,也是作者一人之过。从同仁之间的研讨会上,我也受惠良多,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,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。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仁如此之多,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。甚至从我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中,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,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。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(Ferdan Ergut)及朱尔卡(Alex Julca)交呈的学期报告,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。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(Margarita Giesecke)所作《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(APRA)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(Trujillo)叛乱》的博士论文。

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,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:一是报刊,一是统计调查报告。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,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

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。伦敦的《卫报》(Guardian)、《财经时报》(Financial Times)、以及《纽约时报》(New York Times)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。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，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，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。而联合国的前身“国际联盟”(League of Nations)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。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，但是国联在经济事物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，尤以其首创的堪称为最高峰的《工业化与世界贸易》(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, 1945)，却值得我深致感谢。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本世纪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，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。

本书所叙各项内容，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外，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，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。作者认为，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，或显露任何卖弄学问之嫌。下笔之际，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，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——有时候来源不同，数字亦有差异——偶尔也引用一些出典，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、意想不到、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；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，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。这一类的参考出处，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；其篇章全名，则在书末列出。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，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，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。有关进一步阅读的指南，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。总而言之，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，其用意并不相同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。

不过，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，或仰赖尤重的大作，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。总的来说，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：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，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(Paul Bairoch)；另一位是曾担任“匈牙利科学院”(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)院长的贝伦德(Lván Berend)。作者之所以有“短促二十世纪”的概念，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。至于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，卡佛柯瑞西(P. Galvocoressi)所著的《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》(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)，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，有时却辛辣锋利——此情自可体会——的指南向导。有关二次大战的题目，米瓦德(Alan Milward)的精彩杰作《战争、经济、社会：1939—1945》(War,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—1945)，令我获益尤多。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，作者发现魏氏(Herman Van der Wee)所著的《繁荣与变乱：1945—1980》(Prosperity and Upheaval: The World Economy 1945—1980)，以及阿姆斯特朗、格兰、哈里逊(Philip Armstrong, Andrew Glyn, John Harrison)三位合著的《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》(Capitalism Since 1945)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。此外，华克(Martin Walker)的《冷战》(Cold War)一书，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，值得我们看重。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，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(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, University of London)的萨松博士(Dr. Donald Sassoon)，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，借与我先行阅读。苏联方面的历史，我要特别感谢列文(Moshe Lewin)、诺夫(Alec Nove)、戴维斯(R. W. Davies)、费兹派区克(Sheila Fitzpatrick)几位的

研究成果；中国方面，要感谢史华慈(Benjamin Schwartz)、舒朗(Stuart Sehram)；伊斯兰世界，要感谢拉比达斯(Ira Lapidus)、凯迪(Nikki Keddie)。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，则得益于威列特(John Willet)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(加上他本人的谈话)，并要感谢赫斯凯(Francis Haskell)。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(Lynn Garafola)所著的《佳吉列夫》(Diaghilev)，自是明显不过。

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，表示深深谢忱。首先，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：伦敦的贝德福(Joanna Bedford)以及纽约的葛兰德(Lise Grande)两位女士。在此，我要特别强调对葛兰德小姐深致谢意。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，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，势将永远无法填补；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，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。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(Ruth Syers)以及马伦尼·霍布斯邦(Marlene Hobsbawm)。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，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，预读书中篇章。本书的写作，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。

前面，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，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，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，在此，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。

1993—1994年写于伦敦—纽约

---

# 目 录

出版说明	( 1 )
作者简介	( 1 )
前言与谢语	( 1 )
鸟瞰本世纪	( 1 )
<b>第一部 大灾难的年代</b>	( 27 )
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	( 29 )
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	( 76 )
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	( 122 )
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	( 156 )
第五章 共御强敌	( 209 )
第六章 1914—1945 年的艺术	( 264 )
第七章 帝国告终	( 298 )
<b>第二部 黄金时代</b>	( 335 )
第八章 冷战年代	( 337 )
第九章 黄金年代	( 385 )
第十章 1945—1990 年社会革命	( 435 )
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	( 484 )

---

第十二章	第三世界	.....	(520)
第十三章	“现实中的社会主义”	.....	(560)
<b>第三部 天崩地裂</b>		.....	(601)
第十四章	危机二十年	.....	(603)
第十五章	第三世界与革命	.....	(646)
第十六章	社会主义的失势	.....	(686)
第十七章	前卫已死 —1950年后的艺术	.....	(741)
第十八章	魔法师与徒弟：自然科学流派	.....	(774)
第十九章	迈向新的千年	.....	(827)

## 鸟瞰本世纪

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：

哲学家伯林(Lsaiah Berlin)：“我的一生——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——历经20世纪，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。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，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。”

西班牙人类学家巴诺哈(Julio Caro Baroja)：“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——安安静静地生、幼、老、死，走过一生，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——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……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，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。”

意大利作家李威(Primo Levi)：“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。这种感想，固然令人不甚自在，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，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

的各种记载之后，才慢慢领悟。多年以后，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，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，不但人數极为稀少，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。也许是运气，也许是技巧，靠着躲藏逃避，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，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，不是没能生还，就是从此哑然无言。”

法国农艺学家暨生态学家迪蒙 (René Dumont)：“我看 20 世纪，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、战乱不停的时代。”

诺贝尔奖得主、意大利科学家蒙塔琪尼 (Rita Levi Montalcini)：“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，这个世纪毕竟发生了几项革命，是往好的方向走去……如第四阶级的兴起，以及女人在数百年横遭压制之后得以崭露头角。”

诺贝尔奖得主、英国作家戈尔丁 (William Golding)：“我只是止不住地想，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。”

英国艺术史学者冈贝克 (Ernest Gombrich)：“20 世纪的最大特征，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长的可怕速度。这是个大灾难，是场大祸。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此如何是好。”

英国音乐家梅纽因 (Yehudi Menuhin)：“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 20 世纪做个总结，我会说，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，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。”

诺贝尔奖得主、西班牙科学家奥乔亚 (Severo

Ochoa)：“最根本的事项，便是科学的进步，成就实在不凡……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特色。”

英国人类学家弗思(Raymond Firth)：“就科技而言，我认为电子学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展。至于思想观念，可能则由一个原本相当富于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观点，转变成一个非理性、也比较不科学的心态。”

意大利史学家瓦利安尼(Leo Valiani)：“我们这个世纪，证实了所谓正义、公理、平等等种种理想的胜利，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。但在同时，只要我们有办法将‘自由’继续存留，还是可以从头再来……不必灰心，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丧志。”

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(Franco Venturi)：“历史学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对我来说，20 世纪没有别的，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。”

(Agosti and Borgese, 1992, pp. 42, 210, 154, 76, 4, 8, 204, 2, 62, 80, 140, 160)

# 1

1992 年 6 月 28 日，法国总统密特朗(Francois Mitterrand)事先未经宣布，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(Sarajevo)。当日的此城，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，到这年年底，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 15 万条人命。密特朗此行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，有关波斯尼亚(Bosnia)危机的严重性。的确，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，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